

中日濫戰的前途

顧政之

現在中國戰事的困難很顯明的是日本無法收拾戰局，中國無法支持戰局，在雙方無法的狀態之下還要濫戰下去，這將有怎樣的前途呢？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

第一日本方面雖然因為軍事在中國大陸進行，本國沒有直接遭遇破壞，但龐大的軍費的支出和人力物力的耗消，將使日本的財政支絀，人民的負擔加重，社會經濟因此要感到極端的貧乏。這是一方面，其次是因為拖累於中國戰爭，要趁歐洲戰爭期間，經由外交的商業的或其他實際行動以尋求國家的利益，也成為不可能，因為一面帶着戰爭的負累，一面又要去與國際間作外交的折衝以求結束戰爭，卸下負累，這在外交上的困難和波折，是可想而知的。這又是一方面。至於要想以戰止戰，拿戰爭勝利之所獲以彌補戰爭時的損失，則在中國的大破壞之後與大破壞後中國社會長期的紛擾之中，這希望必然要落空。而日本的國力要疲憊虛弱的。第三國乘之牠還有感到威脅的可能。

第二中國方面如果將不能支持的戰事拖延下去，牠的後果決不是一班無知淺識者之所謂最後勝利，而是不出下列幾個悲慘的結局的。
 (一)是連備安的局面也不能維持。歷史上的備安局面，是在遭受一個僅有武力的外來民族的侵略狀態之下，退縮到經濟上可以自成一個範圍的地域才形成的。如東晉和南宋的備安，都是因為暫時保留了長江上下流域有東南的財富基礎，而當時黃河流域的經濟已不足以控制牠，故得以苟延殘喘。但現在的形勢不同了，日本既不是一個純粹武力的國家，而尚未淪陷的地方如西北則係貧瘠地帶，西南地帶雖稍勝於西北，然在經濟上是受制於東南與沿海一帶的，所以戰爭放濫和拖下去的結束，客觀的條件，將使一個完整的備安局面也成為不可能的。
 (二)完整一點的備安局面既不可得，所有的將只是零亂無

據的政治狀態，豆腐干塊式的殘餘軍事割據，與殘敗不堪的社會經濟現象，這樣，自然中國十幾年來的建國事業要從此墮敗，國家的元氣和力量要從此一蹶不振。

(三)大破壞與混亂的社會狀態之下，共產黨和其他盲動的勢力要抬起頭來，而在大破壞之後再給之以破壞，但他們的行動止於盲動止於破壞，中國的社會物質條件沒有共產主義的基礎要想建設也是不可能的。

這是中國方面濫戰下去的結果。我們是中國國家的公民，我們的立場是中國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所以我們只能根據客觀的事實和國內國外的現實條件來說老老實實的話，使國民知道這些老老實實的情況，從而想出老老實實的救國辦法。

什麼是老老實實的救國辦法呢？一言以蔽之曰：『和平』，申言之，便是要以和平來結束濫戰，用和平來保留一點國力。

第一用和平保留一個中心力量，使牠仍然可以維持國內的統一。
 第二要用和平保留一個中心的力量，使牠還有推進國家建設的可能。

第三要用和平保障已破壞的社會經濟與其他物質建設有昭蘇復興的機會，而未破壞的不致再行破壞。

這樣的和平建國事業，就現在國內外的客觀環境看來，是必須要尋求的，中國的當局和其他朝野的人士，決不應固執某種的成見，孤注一擲，不顧國家民族的成敗利鈍，而對於以和平結束濫戰的老成國策加以忽略。

同時我們也要警覺日本，是日本決不能把中國的無次序和破壞局勢當作有利的形勢來處理。要知中國的無辦法，決不是日本的有辦法。而且就經濟地理的關係而論，中國如果陷於長期的混亂和無底的破壞，日本欲求孤立的繁榮也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日兩國的賢明遠識之士都已出來倡導和平了。我們希望雙方人士，尤其是軍事負責者的方面，要努力結束濫戰以奠定有利於雙方的和平事業。

各方面對於和平運動之認識

劉重道

近重慶方面對和平運動漸漸認識了，恰如中華日報二十八日社論所說：他們也知道和平運動是基於中國人的立場，而且要適合於中國民衆的要求的。他們由反對和平，暗中進行和平，公開否認和平，却進而認識和平之真意。雖則他們口頭上是如何非難和平運動者，但從言論中間表示他們已確認了和平運動的價值。

日本方面一般人士熱烈要求中日和平，但他們對於中國人之和平運動最近有更深刻的認識，東京國民新聞十一月十三日報上的論文則比較更進一步，（自然他們的言論是基於日本人的立場，）他們說：

「汪兆銘是中國人，而且是頂頂愛國的中國人，我們日本人在討論中國的和平運動時對於這一點必須牢記。……處理事變之另一方面，亦可視為將中日間之緊連從利害本位的非愛國者之手，逐漸移到有遠大眼光的中日愛國者之手。」（見中華日報新聞）誠然，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中國人之愛中國與日本人愛日本國原無二致。我們認為繼續抗戰下去不能解決中日糾紛，不但不能解決糾紛，還會演成下莊子所論之虎的結果「小者死大者傷」或者是同歸於盡，所以才毅然主張和平。和平的本質對於中日雙方有利，但在中國人則必堅持中國國家的立場，這是當然的。日本不能要求中國人不愛中國，亦猶中國不能要求日本人不愛日本國一樣，真能愛國的人決不偏狹的排外，而且惟獨真愛中國的中國人和真愛日本的日本人才能夠作到真正中日和平。國民新聞對於這點認識清楚了更具體的說：

「汪兆銘氏所領導之運動，既具有此種性格，故日本方面對中國所要求的，決不能踏出近衛原則一步。倘使日本的要求踏出了近衛的原則，不論其有何種理由，決非中國人民之愛國心所能輕許。汪氏倘由政治關係而採妥協之步調，則汪氏即為非愛國者了，這時汪氏就失掉中國人民之愛戴，汪氏之運動也就變為無力了。」

了，故希望汪氏的運動成爲強有力的組織，以爲中日締結新盟之媒介，則日本人也得與中國人相同期望汪氏的愛國心強烈，而鼓舞激勵其愛國精神，這不但爲汪氏爲中國並且亦是爲日本之福。

（同上中華日報）

這一段比較更清楚，因爲汪先生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的主張正是民衆的主張，中國民衆內心要講而不敢講的話，被汪先生說出來，中國民衆所求的中國獨立生存和行政主權之完整，而汪先生就把這個作他和平運動的基點，所以民衆才擁戴他，他才有力擔當中日和平進而爲東亞永久和平之重任。日本需要和平，也同情中國人的和平運動，他們真誠的表現便是堅守近衛聲明，這樣才援助了中國，援助了汪先生，才可以解決日本結束戰爭之困難。近衛聲明最低限度在尊重中國國家之獨立生存，而表示對中國無領土野心，結束戰爭不割地不賠款。這樣一來中國人看到和平可以不亡，才風起雲湧的來參加和平運動。恰如中華日報十月十八日社論所說：

「這個和平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有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中國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假如中國在和平談判之中，喪失了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中國的國民必不肯爲。中國國民認爲抗戰足以亡國，因此主和。中國國民如看出和平也是足以亡國，必不肯和。既不能戰又不肯和只有陷中國與日本兩敗俱傷的境遇……這是中國人對於和平運動的認識。中國人中反對和平之重慶方面也漸漸認識了和平運動之真意，同情中國和平運動並主張與中國和平的日本也對和平運動有更深切的認識，這些都不約而同的與和平運動者本身的主張接近，和平之前途將大放光明。更希望重慶方面之認識更明顯而轉爲正面的表示，日本方面由東京國民新聞的主張而擴大爲全國朝野上下的主張，進而與中華日報社論的主張完全一致，則中日和平即可實現，中日兩國有志之士應努力促其成功。」

中國社會道德和民族主義

曾芝生

在「中國社會組織和民族主義」一文裏面，我已經指出中國社會具體組織的形態與總理所倡導的由宗族擴大到國族以挽救民族危機提高民族地位的一條道路，但除此之外，還有一條道路，便是要恢復固有的社會道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美德。總理在民族主義的演講裏面關於論到固有道德與民族主義的聯繫時，他有幾個重要的指示。

第一 總理指出過去中國民族因為道德高尚，所以雖然經過幾次的亡國，不但一方面可以保持自民族的存在，同時還能同化外來民族。並且根據歷史上的事實，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和長治久安，除種種文化的發揚之外，還須道德，總理對於這一問題曾就中國歷代國力的盛衰和興亡加以概括的敘述并歸結起來說道：

「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最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國家的地位，各代均能够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同化，因為我們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之大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民族主義第六講）

第二關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美德，總理一方面指出牠們新的社會依繫和新的倫理作用，另一方面他指出這些道德和恢復民

族國家地位的關連。譬如提到忠孝，總理便給予了新的意義與作用。在過去封建的君主專制時代，忠是臣民對君主和奴隸對主人的道德。現在雖然君主制度已經推翻，奴隸與主人的隸屬關係也漸次為自由的僱傭勞動所代替，固然已失其舊的社會憑藉，但忠之道德，如果用忠於國家，忠於民眾，則便有擴大的進步的意義了。至於孝的道德，因為父權家長制的社會組織在中國有普遍的存在和深遠的歷史根基，所以子對父的倫理——孝，充分發達，有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哲學，有「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禮記祭義）的無所不包的人的行為規範。這種道德，如果擴大起來，認為忠於國家民族，廉潔奉公，以身許國，便是大孝，那末國家民族便自然可以強盛。所以總理對於過去由中國社會所孕育出來的這類好道德，在給予牠以新的意義和新的社會作用之後，極力地加以贊揚，他說：

「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國呢？我們的忠字不可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君於民是不可呢？忠於軍又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比其他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民族主義第六講）

此外提到仁愛，便以為中國現在仁愛道德之所以衰微，是國人對於仁愛的實踐行為跟不上固有的仁愛的道德思想，主張要努力實行，提到信義，認為中國人原有深厚的根基，就商業交易與國際條約的遵守而論，都可以證明中國這種進步的道德，需要保持。提到和平的美德，總理着重地加以述說道：

「我們因為已經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民族主義第四講）

「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同上）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為平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為平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民族主義第六講）

這些道德，便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實質，有了這實質，民族才能有真實高尚的地位。

第三 總理不但把中國這種固有的道德，作為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法門和充實中國民族精神的要素，而且更進一步地把它們作為發展到世界主義的橋梁，成為世界主義實現的真實基礎和紐帶。對於民族主義和這些道德的相互參透作用 總理會加以闡揚，以為要完成一個世界大同之治，確立世界主義的真精神，須循下述的道路。所以他說：

「……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有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彰，到現在便退步。……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甚麼作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作基礎。……有了基礎，然後才能擴充，所以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

這是要以民族主義作基礎來保守并擴充和平道德使其成為世界主義的真精神，同時也要以和平的道德作基礎完成我們的民族精神，使成一個統一的世界大同之治，所以總理又說：

「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民族主義第六講）

綜上所述，總理所倡導的民族主義與中國社會道德的依繫關係是很清楚了，由於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作基礎以恢復民族地位，保證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決不是狹隘的種族主義或軍國主義，而具有排外的或侵略的本質，牠的本質，只是止乎反侵略而求滿足自民族獨立平等的願望進而與世界各民族和平結合以實現世界大同之治的，同時由於用民族主義作基礎來保持并發揚上述的社會道德，保證這些道德可以充實光大并對人類的未來關係起着前進的良善的作用，這是總理所提倡的中國民族主義最偉大的地方。

我們現在的任務，便是要遵照 總理指示的方向，使中國的民族主義走上一條正確健全的道路。中國民族主義正確健全的發展對任何國家都有好處，所以任何國家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正不必懷抱何種的疑懼。

英德的經濟戰

白瑞光

一 經濟戰之由來

這次歐戰，從瓜分波蘭開始直到現在德國的西線始終沒有劇烈的國空戰，最近戰爭的形態更趨向於經濟戰，其主要原因在下列幾點：

(一) 德國方面希望列強承認她佔領波蘭之既成事實不願發動大規模戰爭，因此發動所謂「和平攻勢」，英法方面都深知上次大戰之痛苦，也在徘徊猶豫一時不願破釜沉甌的孤注一擲。但自和平攻勢失敗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雙方都不願繼續作戰下去，但都找不出解決她們間糾紛之下台地步，因此便先把激烈的武力戰轉變形式。

(二) 德國的西格非防線，法國的馬奇諾防線都是固若金湯易守難攻的防禦工事。這恰如 Libellert Hart 所言：「近代戰爭防勢較攻勢易，所以一鼓而下的情形是不容易有的，以德國言，根據最近的各種經驗：採取攻勢的方面如欲得到勝利，最低限度有軍械上三對一的優勢，這個勝利還只是局部的，全面的還不止此。空軍方面也是一樣，從前攻的方面有許多有利的優點，但現在都是守的方面佔優越了。」(譯文見中外經濟技萃三卷十期) 雙方都不進攻，這樣的戰爭怎分勝負，因此便都在別種形式的戰爭中來爭取勝利。

(三) 在英法看來，以經濟戰制服德國為最有利，因為上次大戰在軍事方面德國始終沒有落花流水的大敗，在停戰之日，還有許多將領如魯登道夫等，率領大軍遠壓敵境。所以上次德國之敗主要由於經濟封鎖，美國參戰的重大意義也是加強了協約國的經濟戰鬥力。由於經濟封鎖，糧食恐慌才引起了德國國內革命，這樣才打败了德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這次歐戰英法方

面便偏重了經濟戰爭。在另一方面，德國人由於上次大戰之慘痛教訓也深恐糧食和軍事資源缺乏，於是有所謂「擴充經濟武備」，雙方都偏重經濟方面，經濟戰爭乃趨於白熱化。

由於上述原因雙方展開了經濟戰爭，惟在英法方面，法國惟英國之馬首是瞻，在經濟力量上法國也不如英國，這樣經濟戰的主角變成英德兩國。

二 德國缺乏什麼？

德國最大的戰時經濟問題是食物，其次，德國本國沒有棉花、樹膠、錫、白金、汞、雲母等物。又鐵、鐵、銅、鎳、錳、硫磺、羊毛、火油也不充足。勞工的缺乏和其他交戰國同。德國的輸入以食糧品佔進口全體百分之三十九，一九三七年食料之輸入為一九三、七六三萬馬克，一九三八年食料之輸入為二一一、〇七六萬馬克。這些食料包括小麥、玉蜀黍、蔬菜、果實、咖啡、肉、豬油、牛油、牛酪、蛋等。其中除肉一項外，於戰時均為貧乏。小麥玉蜀黍和肉多來自南美之阿根廷，經濟封鎖便會斷絕。果實來自意大利及土耳其，牛油及蛋來自荷蘭，丹麥，因此德國必須與這些國家保持友誼。其次，德國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原料品及半製品佔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三。原料品及半製品包括羊毛、獸毛，棉花、橡皮、木材、石炭、動力油、鐵礦、銅、皮革、化學藥品等均直接間接與軍事有關。羊毛取給於南非及澳洲，棉花則仰賴美國、埃及、印度等地。這些來源除美國外都是英國屬地，一經封鎖來源立即枯竭，美國遠隔重洋，運貨至歐洲極易被敵國中途扣留。石油取自美洲，鐵礦依賴瑞典經封鎖後都有危險性。

但是，對於上項困難德國克服了許多：(一)合併奧國後輸入情形已經改變了。(二)佔領捷克後鐵礦增加了許多。(三)瓜分了波蘭取得許多穀類，更得一大油礦區(汽油在空軍和機械化部隊之使用上極端重要，而波蘭煤油最近二年總產量為每年五十萬噸，一九三七年波蘭從此中煉出汽油十萬噸，又從其他各礦物中煉出四萬噸，若以德國之科學技術提煉，還可加多。)(四)干涉西班牙內戰後以便宜的條件獲得許多原料(汞便是其中之一)。(五)與蘇俄攜手後棉花、石油、穀物也可得到相當的幫助。(六)以國內工業技術製造代用物品。如德國採用羊毛代用品，羊毛的需要便減少了；用人工製造樹膠，樹膠的需要便減少了；火油之三分之一的銷費量也由國內人工製造的原料代替了。食物亦可代替，如以魚代肉是。(七)糧食的統制減少了消費量。如九月九日柏林無線電廣播公告即日起實施「按口授糧制度」九月十三日哈瓦斯巴黎電稱德國實施民間之消費限制辦法，對於飲食物品之用量及次數均嚴加限制，如此則食物消費之量必定大減。(八)原料與食料之儲藏。如養牲畜以供肉食等。

雖然如此，但德國的食糧遺缺之得很多，食料和纖維品(製火藥用)和鐵仍須仰給於海外，石油仍須由南美補充，鋁(製飛機用)須向中歐求之，還有許多上述物質需要輸入。因此德國很怕經濟封鎖。以上就軍事資源立論，其次就對外貿易，論德國也怕經濟封鎖，因德國之最大輸入來源為美國，一九三八年輸入額為四萬萬零四百六十萬馬克，其次為英國及英國領地一經封鎖，輸入便將斷絕。就輸出論一九三八年德國輸出以荷蘭佔第一位，以煤、鋼鐵、機械為大宗，英國佔第二位，以化學製品、鐵製品、機械為大宗，其餘依次為意大利、瑞典、比利時、法國、瑞士、丹麥等，是知德國的輸出以歐洲為市場，單純的封鎖雖不足懼，但怕這些德國輸出國參加英法方面，不過事實上這樣也有困難。

三 英國對德國經濟封鎖的效力

自本年九月八日起英皇頒下命令禁止各國商人私運戰爭用品前往德國，各國輪船凡經直布羅陀海峽，蘇彝士運河，海吉利海峽者不分別國籍，均須由英軍艦檢查，拒不受檢者即移付捕獲品法庭懲辦。這時

候的禁止品分為兩類，一類是軍械，一類是食料，一經查出即予扣留。

據哈瓦斯社通訊說：英法兩國海軍在戰事開始最初五星期內所扣留運往德國的禁止品已有四十一萬五千噸之多。其物品為石油、鐵礦、錳礦、獸肉、化學藥品、橡皮、等。現德國所最感缺乏者為穀類、肉類、果品、脂肪、織成物，尤甚者為棉花。汽油、原油等亦缺乏。英國的經濟封鎖顯然發生效力，不過勝敗還若看德人的對策如何。

四 外交方面的經濟戰

德國人對於經濟封鎖的壓迫，除上述對國內節約與統制外，還有兩種對策。第一就是外交的經濟戰，第二是封鎖英國。關於外交方面的經濟戰，德國經濟部長勞克十月十四日演說宣稱：「英國之封鎖政策完全失敗，德國人民之經濟生活，絲毫未受影響，德國不但另有途徑，取得所需原料，抑且國內尚有代替品，不致完全仰賴外國之供給，德國政府除戰事上之擴充武備以外，尚有經濟上之擴充武備，對外則與東南歐諸國增進關係，即令戰事延長，德國亦可保持百分之八十之平時對外貿易」(十月十五日海通電)這是很顯明的說，德國對付封鎖的政策，對內則造代替品，對外則為外交方面的經濟戰。這種外交經濟戰又可分為東歐與南歐兩方面：

東歐方面西班牙對德經濟關係已如前述，比利時為農業國，比利時經濟代表團之訪德顯係進行供給穀物談判。荷蘭為德國之鋼鐵機械市場，又仰給其牛油及蛋類，所以德國加兵威脅使他們幫助德國。荷蘭一向親英，因此英國也拉荷蘭，於是英荷經濟談判，並且英國對荷亦施壓力使其國際貿易有利於己。原來德國向以歐洲為他的市場，經濟封鎖後凡由海道來的海外供給均將被阻，則不得不從陸路方面尋求資源供給之與國。在英國方面深知欲封鎖德軍事資源之輸入和對外貿易單靠自己力量不敷，於是盡量拉中立國，於是轉為外交方面的經濟戰。但這裏西荷比三國顯已傾向德國方面。

在南歐方面，意大利的純正中立即不參加對德封鎖，這對德國是有益的，英法對意大利的拉攏至今未能忘情，最近仍有法意調整邦交的消息，但十一月二十三日意大利政府否認與英國成立商務協定，而意國對於英國將封鎖地中海和扣留向德輸入貨品極為不滿，拉攏意亦

國際現勢與中國

古越

現在國際正如一條大鎖鍊，嚴格說來，國際間的問題，已沒有純粹一國與一國間的單純關係，無論任何兩個國家的問題，都和兩個國家以外的其他國家息息相關。在強大的獨立的國家，固然這樣，在弱小的或帶有殖民地性質的國家尤其這樣。

中國是帶有次殖民地性質的國家，支配中國的不只是一個主人。中日的戰爭，也就不能和其他的國家發生連帶的關係。並且中國是具着對於國際的依存性的。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因依存於國際對中國的均勢，才能够存在。這一次亦是完全依存於這一個關係而敢於抗戰能够抗戰。所以中日的問題，從其本質發生經過現勢及前途看來，都不只是中國與日本的單獨問題，而是國際問題的一部份，因此：要明瞭中日問題，單從中日本身去觀察是不够的，是不澈底的；反之要從國際間對於中國的關係，甚至國際其他方面相互間的關係去考察，才能把握問題的全面，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自從八月間由於蘇德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所促成的歐洲戰爭爆發之後，國際間的情勢，遂發生了絕大的變化。中國對國際間關係，亦就在這個時候成爲前後利害不同的分野。在此以前，與中國有深切利害關係的英美法蘇諸國家，他們之間，雖然有根本的矛盾，即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矛盾對立着。但在那時的另外一種國際局面，即所謂侵略與反侵略民主與極權這二個陣線之間，他們都站在反抗德意日的地位，他們並且正在進行所謂英法蘇的公約，以實施所謂集體安全制度的保障，雖然終因前面所說的根本矛盾，使他們的結合備受阻礙，終至無所成就，但在這個時候，他們在國際的立場上，大體上還是一致的。

對於遠東方面，蘇俄深怕日本進佔了中國，足以威脅蘇俄的東境

，做了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俄的前鋒。美國爲了維持她四十年來一貫的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對於日本的似乎有獨佔中國模樣，自然亦不能容忍。英國在中國有巨大的權益，在南洋及印度有廣大的殖民地，她認爲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要是得手，她將逐漸退出中國市場，而南洋及印度的殖民地的統治，亦有隨時動搖的可能性。至於法國的情形正和英國一樣，她對遠東的態度，向來惟英國之馬首是瞻。在這些情形之下，英美法蘇諸國，支持中國對日的抗戰是一致的。

但是正因他們相互之間，還有不可解的矛盾，他們各個的本身，還有其他比較中國更重要的問題牽纏着，這又使他們對遠東不能積極的或共同的行動，甚至有時他們在衡量利害輕重的情勢之下，他們會對日本作種種的妥協或讓步而不惜犧牲中國方面的利益。

由上看來，可知假使沒有他們對中國的共同利害，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他們個別的援助，而能够或敢於和日本作戰。又假使他們能够進步對中國作共同的積極的援助，中國對日的抗戰的成績，自然不致係現在這樣的局面。惟其他他們對中國的援助是基於其一己的利害關係，是有限度的，猶豫的，並且是可能變化的；所以中國對日抗戰的情形，乃陷於這樣半生不死的狀態。

歐戰以後，整個國際的形勢，起了極大的變化，兩個不共戴天主義各別的國家，既然攜手言好，過去所謂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對立，暫時是沒有了，所謂反共軸心是瓦解了。侵略與反侵略民主與極權的陣線亦根本不復存在着，因之，昔日的英美法蘇，原來站在同一的地位的，已因蘇俄的跑到另一方面去而形成了相反的利害。

蘇俄雖然還堅決聲明保持對於歐戰的中立，沒有和德國訂立軍事同盟條約，但從她這次的根本政策看來，顯然是要避免「思想的戰爭」，「新十字軍的結合」，明白點說，即在防止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連德國在內——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而保衛其自身的和平建設。所以牠不惜鼓動德國掀起歐戰，使資本主義國家自相殘殺，轉變他們戰爭的方向，而牠可以坐收漁人之利。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蘇聯就非支持德國使歐戰蔓延下去不可。歐戰一經蔓延，蘇聯對於德國恐再不能限於經濟的援助，而無可避免的被拖下水了。不然的話，假使交戰國的雙方，尙未至精疲力竭的境界，新十字軍的組織，還是隨時有可能性的，史丹林之兢兢戒懼者以此。

美國的對外政策及輿論，現在固然亦是以保持中立爲方針，可是自中立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之後，她對英法實際上已由精神的進至於物質的援助了。歐戰一經擴大，尤其是蘇俄如果熱烈的參加在德國方面，那美國即要置身事外，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其勢亦有所不能了。

這就是說，歐戰一經擴大，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能够嚴守中立的，其結果對於遠東方面便會有如下二點的影響：

第一 英美法蘇等國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歐洲或者比在中國的利益關係更爲重要的問題上面，而把中國這一方面疏忽了，對於中國的各種援助，也就會逐漸停止，最少是減少了。中國對日抗戰，原來就是依存於國際的援助的，至此便失了保障；而在日本方面，反得乘列強流有餘力東顧或西顧的機會，以其優越的力量，加緊對於中國的進攻，以期早日解決中國的戰事。我們只消看歐戰開始的時候，日本即提出交戰國家——其實即是英法應即撤退在華駐軍的要求，便可以明白日本的居心。而英國最近，亦已實行了這個要求的一米，即已撤退華北的成軍了。

眼前這個局面之所以還未完全形成，日本還不能如願以償，乃是

歐戰還未擴大，美俄還未正式加入漩渦，而英法一方面，有美國替他保障，另一方面，他自己也還不至十分沒有餘力可以顧及遠東的緣故。

第二 在歐戰即將擴大的前夜，交戰國的雙方，必然的都在外交上努力，以期爭取與國，奠定勝利的基礎。眼前他們在歐洲方面，已經是這樣的做法。在遠東方面，亦已有了端倪。

姑無論歐戰擴大，太平洋將成主要的戰場，而日本是太平洋上強盛的國家，且佔着地理上優越的地位，足以舉足輕重，爲雙方所必爭取的對象外。即就對於歐洲方面的作用而論，假使日本參加於交戰國的任何一方，都足以牽制其他一方面的兵力，而予他以種種的不利，因此十月卅一日蘇俄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在最高議會的演詞特別表示「蘇日協定在莫斯科簽字後，邊界和平，已完全恢復，蘇日邦交改進已經過第一步。」「蘇日商務談判，亦有開始之可能，蘇日貿易之發展，於雙方均屬有利。」「吾人與日本邦交之改進：吾人將根據本國基本政治之立場及對於和平之關心，已與之接近」。而對於中國，却一語不提，無非是在向日本暗送秋波，誘致她到蘇俄這一方面去。最近英國的對日妥叶，急開談判，亦無非是爲歐戰的問題着想。

至於美國，像駐日大使格魯的演說，國務卿赫爾的聲明。美國對於檀香山菲律賓的增防，以及畢德門等禁止運輸軍火原料赴日的提議，一般輿論上，不予續訂日美商約的主張，這些強硬的態度，據一般人的觀察，都認爲是美國決以獨力維護其在遠東的利益，甚至替英法維護其在遠東的利益的代表，這才始不無理由，然而這僅是一方面的理由。我們認爲美國另一方面的理由，是利用日本對美國經濟上依存關係的弱點，故意以強硬的姿勢，迫使日本參加美英法的陣線，雖然美國的企圖，未必有多大成就，但牠這種做法，和蘇聯的做法，正所謂異曲而同工的。如果有人希望美國會在這個時期，單純爲了其在遠東的利益，再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以至不惜與日本決裂那是非愚即妄的

想法。

無論是已在進行的日美談判，英日談判，以及正待進行的日蘇談判，他們在表面上標示的談判範圍，固然是爲了日蘇、日英、日美、等問題，但是蘇美英等國的骨子裏，却無疑的是爲了整個的歐戰局面着想。上述的問題的解決，不過是達到這個最後的目的的方法。而在日本方面，必將以解決中國事件爲主要的課題，換句話說，即希望談判的對方停止對中國的援助，甚至幫忙日本去解決中國事件。照眼前形勢看來，日本將來走的可有三條路：

第一 是走英美法的路，以日本保護英美法在中國的權益及牽制蘇俄，換取英、美、法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及停止援助中國的條件。

第二 是走蘇、德、的路，主要的條件是日本負擔牽制英美在太平洋的海軍，搖動英、法在東亞的殖民地，而蘇俄則停止援華，以壓力加諸中國；蘇聯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位置，二國劃分滿、蒙、新疆及西北的勢力範圍。

第三 是嚴守中立，樹立多邊友好關係，以取得便利解決中國事變的條件，並得乘歐戰之機會以漁利。

這三條路之中，以最後一條對於日本爲最有利，現在日本所擬走的，也就是這一條路，但走這路的內容，太過迂迴而複雜了，所以難免要經過相當的波折。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八）

十五 統一與割據

割據是中國近年來衰弱的原因，外侮之來也由於統一的局面沒有形成。歷年來多少富強國家的方案，無不從打破割據，實現統一着手。有的以分權求統一，有的以武力求統一，北伐後決定以建設求統一。

中國是次殖民地的國家，中國的外交，一向就處於被動的地位，俯仰由人。因歐戰後國際關係的複雜，牠所應走的外交路線，不但牠自己不能決定，連英、美、蘇等也不能單獨替牠決定，而有待於日蘇、日美、日英等談判的結果。假使中日的關係，沒有改變的話，則日本走的是第一條路，中國走的就是第二條路；反之，假使日本走的是第二條路，則中國所走的就是第一條路。如其日本走的是第三條路，那末中國也只有照樣走第三條路了。

無論走的那一條，都於中國不利，況且這所謂第三條路，與日本所走的是同其形式，而異其內容的，因爲中、日地位不同，國力不同的關係。這原來是一條舊路，在抗戰以後，歐戰以前，中間二年又五個月中之所走的舊路。不過因爲前後國際形勢的不同，從前走之而有利，今後却要大受其害了。主觀上希望維持多邊的友好的關係，實際上恐怕一邊也不討好，一邊也沒有關係了。所以這簡直是一條死路；然而現在政府當局，所要走的，或能走的，亦似乎只有這條死路。

生路不是沒有的。要看我們能不能本着獨立自主的精神，打開中、日的僵局，保持遠東一隅的安定，站在主動的地位，調整對英、美、法、蘇的關係，並且，乘他們沒有干涉中國的餘暇，埋頭苦幹從事於復興的工作。惟有這樣，我們才能够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避免亡國的慘禍，而成爲一獨立自由的國家。

望雲 寄自內地

，中國才在建設中去向統一的路子，統一的局面尚未鞏固，七七事變的炮火摧毀我們正在進展中的建設，大一統的統一局面又受到傷損。中國不統一能引起外侮之來，中國的統一將完成又引起日本的侵略。有的說日本這一次對華用兵係打擊中國行將完成的統一局面，確有至理。因爲在統一局面之下，中國可以致力建設，因臻於富強之

域。中國既富且強之後，當可抵禦異族的侵略，保全領土主權的完整。所以爲日本計，要在中國統一沒完成前，給中國以致命的打擊，爲中國計應當保持統一，鞏固統一，以統一的力量抵禦外來的侵略。在中國問題上，日本之所利，正是中國之所患，反之亦然。中國利在統一，日本利在使中國四分五裂，以便各個擊破，蠶食以盡。這一次戰爭是日本阻礙中國統一的戰爭，是日本破壞中國統一的戰爭。中國須要以統一保全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中國須以統一建設現在的國家。抗戰以前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安內」政策，即是完成統一的必要工作。在安內政策之下，禍國殃民的共匪流徙他方，各種建設突飛猛晉，中國漸跨入於現代國家之林。

抗戰是抵禦外侮，須要統一的力量支持戰爭，更須要在對外戰爭之中完成對內的統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始可達到。事實上在戰爭中，中國的統一不僅沒有爲日本的炮火擊碎，而且因對外的戰爭在某些方面加強統一的程度。在戰爭中，軍令統一了，在戰爭中，軍人的地盤觀念沒有了。四川的軍隊可以調到滬滬一帶作戰，雲貴陝甘的軍隊可以參加保衛徐海的戰爭。所有的軍人全是爲對外戰爭而共同駐防，所有的軍人不再爲抱拳地盤你爭我奪。軍令如此，政令，財政莫不如此。但這裏有一個例外就是陝北的什麼特區，國軍以外的什麼紅軍。在陝北特區之內，在有色軍隊之中，一切法令，制度，設施均異於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任何省區，任何部隊。他們造成統一局面下的地方割據，他們形成國內有國，他們在現行法制以外保持特殊地位。有些人以這些行動是分散統一力量，破壞統一局面，便高呼「加強統一」，「鞏固統一」，以統一力量保障戰爭勝利。於是在加強統一口呼之下便有三一主義出現。

什麼是三一主義呢？是國民黨及服從國民黨的一般文化工作者於淞滬戰爭後在武漢鄭重宣言，提出的口號，即是「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指的三民主義，一個政府指的國民政府，

一個領袖指的蔣委員長。很明顯的這三個口號是針對什麼國際共產主義，什麼蘇維埃政府，什麼馬克思列寧的信徒而發。這三個口號很普遍而有力，在一般民衆中形成牢不可破的堅固信仰。在武漢時一般國民黨及同情國民黨的文化工作者爲的發動實現這三個口號的運動起見，組織了一個「三一聚餐會」，每逢月之一號，十一號，二十一號大家聚在臨時規定的地方聚餐。有些人說「三一聚餐會」的命名由於上述三個口號而來，有的說「三一聚餐會」的命名由於每逢一聚餐。每月有三個一日，即是一月聚餐三次，故名三一，不過與上述的三個口號巧合罷了。無論命名的意義由於那一個，「三一聚餐會」的工作與集會用意是在加強統一力量，實行上述的三個口號。參加這個聚餐會的其初不過二三十人，日後逐漸增加，最盛時達一百餘名。每次聚餐，飯後有報告，講演，討論等事項，報告與講演多是身負實際責任及專門家到會担任。討論的題目多是研究怎樣推動文化工作，清除輿論界的陰霾之氣。每次聚餐時間常自晚七時起至夜十一二時始散，因爲聚餐會的陣容齊整，內容充實，參加者不僅越到越多，而且得會者都具有極大的興趣。「三一聚餐會」起自何時，已不能記憶，大概是三月間開始。七月二十一日舉行末次聚餐會，到會者已不如以前之多，因爲小部份人業經西去重慶，大部份人正準備離漢赴渝。自從這次聚餐會後，武漢大部份文化工作者多因武漢緊張而西去。到重慶後，重慶的文化界原有「八一三聚餐會」，「三一聚餐會」的生命隨武漢的危急而終了。在重慶曾經參加「三一聚餐會」的人，想重整旗鼓，組織聚餐會，亦未能如願。但是小規模的定期聚餐會仍是有的，不失爲戰時文化工作的核心組織。

愛護國家者，希望加強統一，看重派系勢力者，便不如此想，他們提出「民主」「分權」來破壞統一，保障其割據勢力的存在。「民主」本是指運用政治的精神與制度而言，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它的唯一特色在人民說是自由，在國家的形式說是統一。我們遍查歐美

各國，那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不是統一的近代國家呢？「橋逾淮爲枳」，歐美的制度輸入中國，也就變了。在歐美各國民主政治是統一國家下的產物，而且實行民主政治可以鞏固統一國家的存在，在中國是以分權保衛其特殊勢力，是以民主便利其政治割據。所以陶希聖先生在主持藝文研究會的工作時對於民主政治曾提出兩個消極條件，「第一個消極條件是：民主政治不是政治割據。要把割據當做民主，是歷史的倒退，不是社會的進步。第二個消極條件是：民主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國家對外生存死亡的抗戰的機會，用民主鬥爭來減低政府的力量，混亂政治的秩序，這是民主政治所不許的。」此外，文化界對於特區與割據勢力的攻擊文章，真是數不勝數。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中國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張君勱公開發「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的一封信，在該信中，張先生很平心靜氣的教勸「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重，放棄其特區的割據政治，改編其派系的軍隊。張先生並說願觀歐美各國，沒有任何國家，可容許一黨一派編組其特殊軍隊，保有其特殊武力者。中國共產黨既願爲國家盡力量，此等仿舊國家統一，減損抗戰力量的特殊制度，應當自動取消。這封信遍載國內各報紙，可是「中國共產黨」的要人們沒有公開的正式的答復。他們是真的無言答對，還能說說些什麼呢？

「統一與割據」的鬥爭，表現在軍事上的就是「保衛某地」。

譬如淞滬戰後，有「保衛首都」，後有「保衛大徐州」，徐州失陷後，有「保衛大武漢」。狂叫保衛而自己不肯出力者，都是所謂「方翼」人物，他們想以此減低國民對政府的信心，他們想以此犧牲中央政府統轄的軍隊。其實在對外作戰時，中國的一草一木，寸土寸地都應當保衛，何必單提出來保衛某地呢？所謂左派人狂叫此等口號，他們是想以此種方法紊亂政府作戰的步驟，使政府不得不在險地集中軍隊。他們又以此鼓動人民對特定地點的注意力，吸引人民的視線，以便等待保衛失利後，使人民心理上遭受嚴重的打擊，而對政府的信

心一蹶不振，他們便可在民衆對政府失掉信心時，擴充其割據勢力了。本來近代戰爭是爭奪都市的戰爭，都市失守，鄉村便無可利用，所以在作戰時對都市應當盡力量防守。但是同時也要知道中國對日作戰，不利於短時的會戰，而利於持久，死守一個處所不是將主力軍集中一地等候會戰麼？以避戰方爲有利的戰略反而等待會戰，不是掘井自陷麼？所謂左翼的某些無聊文人及政客，非不知之，而故意爲之者即在借保衛某地的會戰，以犧牲中央政府的軍隊，減低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如同徐州會戰時，一般無聊者鼓噪的太利害了，使全國的視線都集中在徐州一隅。及至會戰失敗，政府怕此等失敗給民衆一個冷水澆頭，不得不派遣飛機遠飛日本，擲些紙彈，以補救過於失望的壞果。所以第一次參政會在武漢開會時，所謂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品幾個參政員，提出「保衛大武漢」提案，當時一般中立者及國民黨的參政員即草擬「保衛西北」提案以相對抗，聽說後者的提案未能送出。在實際上講，保衛武漢，只有先保衛西北，或者在武漢取守，西北出擊。歷史很多奪取武漢的戰爭，都是先攻武漢上游一帶如襄樊之地，才可使武漢安隱到手。如只得了武漢對於西北控制不了，武漢仍不能久存。如晉之滅吳，也是先滅蜀，順流直下，吳遂滅亡。現在談保衛武漢，只有從西北出擊，或者加強西北的力量，使盤踞武漢的敵人感受威脅。有些人以「保衛西北」對抗無聊者「保衛武漢」的提案，不純是政治鬥爭的作用，也有軍事上的卓見。

十六 歸還我們的外蒙古

索還外蒙古與蘇聯出兵是含有同等作用的政治鬥爭口號。有人說中國抗日，蘇聯一定出兵幫助中國，事實上蘇聯並沒有出兵，可是依靠蘇聯爲生的一些人總仍捏造蘇聯出兵的消息，在那裏瞎吵，以壯自己的聲勢。一方面憑臆造說出兵，一方憑事實說不出兵，各不相下，事實勝於雄辯，不相信蘇聯出兵者，便提出歸還外蒙古的口號，以攻

請捏造蘇聯出兵的人。在中國人希望蘇聯出兵，明知蘇聯不肯，故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求歸還我們的外蒙古，在蘇聯是應出兵而不肯出兵，如能歸還中國的外蒙古，較之實際出兵容易些。照道理講，一個日本已够中國打的了，怎麼於抗日之外又向蘇聯提出索還領土的要求。中國人再不會運用國際局勢，也不至於愚到於敵對日本以外，再來開罪蘇聯。中國人在沒有與日本開仗前，未提出索還外蒙古的要求，既與日本開仗後又提出索還外蒙古的要求，這是什麼道理呢？完全是對內的政治鬥爭的作用較多，對外的國際關係的運用較少。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品動輒狐假虎威，仗恃蘇聯，用於中國國內的政爭，今日說蘇聯是最能幫助中國的國家，明日說蘇聯就要出兵中國共戰日本。他們的意思是說蘇聯對中國的友好舉動，來增加自己在中國國內的優勢，這就是具有國際性的所謂政黨的含意。明眼人知道蘇聯對抗戰中的中國並不比德意對中國好，遠論比得上英美法呢？於是便以仗恃蘇聯謀生者的矛攻他們的盾，你宣傳蘇聯對中國絕對友好，你宣傳蘇聯可以出兵共同抗日。喂！請拿出事實來！那是蘇聯出的兵，那是蘇聯對中國友好的表現？我們只看到九一八以後除日本外第一個承認偽滿洲國的國家是蘇聯，因為蘇聯出賣中東路時，是日本，蘇聯，偽滿洲國的外交代表相聚於一堂。這還不算，蘇聯不是常常向日本獻媚求好，請求定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以減輕日本的後顧之憂麼？這還不算，蘇聯於中日戰爭既起之後，不僅不助中國，反而幫助日本。張鼓峯事件發生，蘇聯兵敗求和，日蘇在東北的關係一時和緩，使日本得移住滿洲之兵南攻廣州，算是蘇聯助了日本一臂之力。蘇聯對於中國的抗戰幫助在什麼地方呢？不錯有些軍火的供給，還是我們拿礦物及農產物換來的。與中國對德國的貿易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就是從德國換來的軍火好些，從蘇聯換來的軍火壞些，運費貴些。一般仗恃蘇聯為生者不察事實，硬造蘇聯出兵；蘇聯對中國絕對友誼。中國的愛國者聽不慣這些不合事實的狂吠，要求蘇聯出來，證實宣傳者的話是真

是假。要求蘇聯以出兵證實宣傳者謠言，未免太苛，不得已而求其次請蘇聯以歸還我們的外蒙古來證實蘇聯對中國的友誼吧。中國人提出這一點，決不是有意與蘇聯為難，是有意教訓仗恃蘇聯為生者的狂妄舉動。

此次抗戰，是中國對外的民族鬥爭，中國的民衆不問階級，不問職業，不問種族已一致參加了，惟有外蒙的同胞被縛在戰爭圈外。是外蒙的同胞不肯參加保衛其祖國的戰爭麼？不是的。是外蒙的同胞沒有保衛其祖國的自由。外蒙同胞保衛祖國的自由已為蘇聯剝奪去了。要說外蒙同胞是自願脫離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而自治，這個自願是被迫的，是個自治是掩護蘇聯的侵略行動。有外蒙獨立的歷史可以證明，當清末民初，中國衰弱混亂時，帝俄政府露佈其侵略野心，以協助外蒙古實行自治為名，強迫外蒙脫離中國統治。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無力對外，更無暇侵略外蒙古，担制外蒙古了。外蒙同胞遂自動宣佈取消自治，重行歸屬中國統治。蘇聯革命成功後，基礎逐漸鞏固，國力日漸充實，有餘力向外侵略，於是我們的外蒙古遂成現在的狀態——蘇聯附庸。由這些事實看，外蒙古是自動脫離中國而實行自治呢？還是被迫而出此呢？東北四省沒有日本的壓力不會脫離中國的統治，外蒙古如沒有蘇聯的侵略，也不會實行其假的自治。既往不究，這些陳賬還算它幹什麼？仗恃蘇聯為生者不是說現在蘇聯對中國好麼？好！拿出個好的樣子來，歸還給我們的外蒙古。說者也知道在中國衰弱時，對蘇聯講這些話沒有益處，而仍不能不說者，最大作用在證明中蘇的關係是好到如何程度，在截穿仗恃蘇聯為生者的虛偽面目，捏造宣傳，在抗日的戰爭上說，如果蘇聯肯歸還我們的外蒙古，減少蘇聯紅軍在中國外蒙古的壓力，外蒙同胞即可自動的勇敢的參加保衛祖國——中國的抗日戰爭。外蒙的同胞參戰，可使日軍防綫延長，北起滿蒙南至廣州。蘇聯也可因此幫助了中國，也可以避免因幫助中國給日本的同盟國有所藉口。蘇聯不肯為此者，也是看重他本國的利益，什麼援助被壓迫民族，領導世界革命全是掩飾侵略的假把戲。這是革命後的蘇聯的獨裁者斯大林聰明於帝俄沙皇的地方。文化界關於索還外蒙古的論文，集成兩三本小冊子，題名「歸還我們的外蒙古」，弄得中國共產黨光閉口無言，虛偽的宣傳也沒有人再信了。

華僑對祖國的貢獻

雪非

華僑對於祖國的貢獻極大，抗戰與和平都需要華僑的支持，抗戰與和平的目的沒有二致，現在需要和平，我們相信華僑必可以支持抗戰的精神和物質轉向和平貢獻到祖國的。這是一篇華僑與祖國一集體寫作小冊中的一篇，我儘先發表在這裏。

編者識

一 華僑過去對於祖國的貢獻

吾國散處在海外的僑胞，為數約近千萬，他們雖居於異邦，食於異邦；但他們愛國愛鄉的觀念，非常濃厚。這因為他們在異邦常常遭受着當地政府的歧視與壓迫，使得他們感覺到非使祖國強盛，不能提高他們的海外地位，因此，他們對於祖國的革命及建設等運動，無不積極參加貢獻人力物力期其完成。例如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奔走革命的時候，就得到僑胞的助力不少。一九一一年光復革命的那一役，各地僑胞捐助軍餉的錢，達數百萬元，而實際參加革命的人，亦復不少。所以孫中山先生說：「華僑乃革命之母」；而胡漢民先生也說：「華僑對於革命是很熱誠的，大概是受了外國人的壓迫，所以對於祖國的觀念比較深切。華僑中有頭腦的人，總是想把中國造成一個體面的國家。」

民國成立以後，中間經過討袁，護法、北伐、剿匪「一二八」長城、綏遠諸役及「五九」運動，「五卅」慘案等等，他們無不做國家的後盾，或抵制日貨，或輸財救難。他如對於國內的建設及救濟事業等等，也有很大的貢獻，而華僑匯款一項，對於祖國的經濟尤多幫助。我們祇要翻一翻中國國際收支的統計，就可以知道華僑匯款實抵補着中國全部或一大部份的入超。中國國家經濟所以尚未瀕於破產者，就是因為每年有着三萬萬元以上的華僑匯款來抵補入超的緣故。其有功於國家，實非淺鮮！

二 抗戰發運後的華僑愛國運動

「七七」事變發生後，海外僑胞對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尤感悲憤，紛紛致電中央擁護抗戰。這二年又四個月以來，他們輸財救難，以及投資各種建設事業等等，誠難以盡述，茲就舉大者，略舉一二如下：

(一) 捐款——自對日抗戰的消息傳至海外以後，各地僑胞無不深感興奮，除紛紛致電中央擁護抗戰國策以外，并匯寄大批款項，慰勞前方將士，對於戰區災民的救濟，亦極為踴躍。南洋的僑胞特於去年雙十節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個籌賑總會，美、菲、澳三洲的僑胞也有抗日救國會或其他類似的組織。各地僑胞在籌賑會或救國會等策勵之下，分頭進行抗日救國的勸募工作。其籌款方式，有演劇、游藝、展覽會，賣物報効等等。就捐輸方面說，有特別捐、月捐等等，自富有以至勞動各階級的僑胞，無不慷慨解囊。就南洋一地而言，自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八月，各方的捐款數字如下：（據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南僑大會的代表口頭報告）

荷屬東印度	國幣	五、〇七三、四一八
港幣	二一九、五六八	
荷幣	一、四一四、九六一	
菲律賓	國幣	五、二四二、〇二〇
法屬越南	國幣	四、四〇〇、〇〇〇

（註一）

英屬緬甸	國幣	二、一九三、九〇四
暹羅	國幣	八、〇〇〇、〇〇〇
英屬馬來亞	國幣	一九、五七七、一九三
英屬婆羅洲	國幣	八九七、八九六
總計	國幣	四五、三八四、四三一
	港幣	二一九、五六八
	荷幣	一、四一四、九六一

(註二)

(註一、註二)係公債義捐合計。

據今年四月僑務委員會發言人聲稱：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止，海外華僑的捐款，關於指定撥充軍費方面者，至少已在一萬萬元以上，由該委員會經手的，佔此數中之六千八百五十萬元。海峽殖民地與荷屬東印度兩地的華僑較多，所以捐款的數目也最多。各地的數字如下：(單位元)

海峽殖民地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
爪哇	七、〇〇〇、〇〇〇
菲律賓	四、五〇〇、〇〇〇
蘇門答臘	三、五〇〇、〇〇〇
緬甸	二、五〇〇、〇〇〇
英國	二、五〇〇、〇〇〇
美國	二、七八七、〇〇〇
加拿大	一、二三八、〇〇〇
夏威夷	四〇〇、〇〇〇
澳洲	三七五、〇〇〇
紐絲倫	五三四、〇〇〇
其他	一九、四一六、〇〇〇
總計	六八、五〇〇、〇〇〇

據一般估計，自發動抗戰至目前為止，華僑的捐款，如義捐、月

捐等等，總數當在四萬萬元以上。而自廈門、廣州、汕頭相繼淪陷後，華僑直接救濟家族及親友的款項，並不計在內。自抗戰以來，沿海各口岸以及重要城市都相繼失陷，淪陷區擴展至十一省，政府的財源稅收，國民的經濟生活都受了莫大的打擊，而中國經濟所以尚未瀕於崩潰者，大部分實不能不歸功於華僑的接濟。

(一)募債——勸募救國公債，也是華僑在抗戰中的一種熱烈舉動。最初勸募的方法，係由各地僑團分頭進行，嗣以各地籌賑會成立，乃由該會負責進行，收效益大。購買公債的，最初以人為單位，資產家認購在十萬元以上的，為數很多，其後各方復提倡社團資產移購救國公債，於是具有以社團為單位的認購，公債的銷路益廣，最後復提倡連鎖公債，凡接護連鎖公債信的人，除至少須認購公債五元外，並須照抄連鎖信若干份寄戚友，如此輾轉推銷，成績更好，據本年四月間救國公債勸募總會發表自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止，海外華僑所認購的救國公債，其數字如在：(單位元)

菲律賓分會	一一、七三〇、二二〇、〇三
新加坡分會	四七、四七〇、五六〇、四二
巴達維亞分會	七、七一五、八三二、〇六
泗水合計	二、六三三、一五四、八七
棉蘭合計	一、三二八、四七六、二六
其他合計	二、六八八、八二六、五〇
紐約分會合計	一四、八二七、九二四、五一
舊金山合計	八、四九一、六四〇、二七
香港合計	六、六四四、二七七、〇九
安南分會合計	四、三六二、七〇一、〇九
暹羅分會合計	六、八五九、三七三、〇六
印度及緬甸分會合計	四、七〇六、二五一、三七
倫敦分會合計	二、三三六、三〇〇、七五

澳洲分會合計 三、四二一、一三六、二二三
澳門分會合計 二五五、一一二、三七七
其他合計 七一六、七五四、九一

總計 一二六、一八八、五四四、八八

以上的數字，完全為認購救國公債，此外如二十七年五月發行的金公債，全年全月發行的國防公債，本年發行的建設公債，軍需公債等，雖由國家銀行承銷，但僑胞私自認購的，為數恐亦不少。

(三) 抵貨——海外各地僑胞在抗戰中除積極進行捐輸的工作外，對於抵制日貨的運動，也頗努力。各地都有抵貨會的組織，嚴格進行查貨及勸好工作。深明大義的華僑商家，都自動封存現有的劣貨，或將劣貨拍賣助賑。此種行動，在南洋各地尤為普遍而激烈，最近兩年來日貨在南洋所以日趨萎縮者，完全由於華僑抵貨所致。

(四) 投資——由於華北、華中及沿海各省的工商業被日本摧毀及沿海口被日本封鎖以後，政府為着要培養國力起見，極力提倡在內地復興工商業，并謀發展西北及西南的交通建設，但以國內的財力有限，不得不鼓勵華僑回國投資。計自抗戰迄今，僑華投資於各項建設事業者，大約當在二三萬萬元以上。其範圍較大者有陳守明組織的華西墾殖公司，胡文虎組織的滇邊實業公司，單就華僑投資於開發雲南富源的資金，即已達一萬萬元以上。其有益於國家民生，實非淺鮮。

(五) 實際參加抗戰——華僑實際參加抗戰的集體組織，有華僑救傷隊及機工返國服務團，他們懷着熱血一批一批的投奔到祖國的懷抱裏去服務，據本年八月的統計，華僑救傷人員大約在百五十人以上，而返國的機工，則已有二千二百五十三名。

(六) 其他——抗戰中的華僑救國工作，除了上述各項以外，還有節約獻金，徵募寒衣，個別的回國從戎，拒絕替敵人搬運貨物及工作等等，這許多熱烈的愛國舉動，至堪令人敬佩。

三 我們的目的與任務

僑胞們為什麼這樣熱烈的愛護祖國呢？這當然是為了爭取國家的生存與獨立及提高民族的地位。

我們知道自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即以征服中國為標的，故對於中國取求無厭，「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本不崇朝而得佔領我東北四省，因此，一部分軍人的野心更熾，他們多以為對中國可以不戰而勝，當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初，日本即懷着此種心理，不意中國覺悟到如再不加抵抗，則無以求生存，而全國人民，亦知非盡本位的責任，不足以表現我大中華民族偉大的精神，更不足以言救國。因此全國上下以及海外的僑胞，無不瘋狂地負起本位救國的責任來。在前線的將士們，雖在敵人的強烈炮火之下，依舊是前仆後繼，視死如歸。在人民方面，雖受盡顛沛流離的痛苦，也沒有絲毫怨悔。在海外的僑胞們，雖在萬分的惡劣環境中，仍始終不懈地以人力物力來支持祖國抗戰。這種精神，的確是我中華民族可能得到生存與獨立的表現，所以打了二年有半，日本即覺悟到中國已非「九一八」的時代可比，更非速戰決可以覆亡中國。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前首相近衛發表了願與中國和平的聲明，這便是我們奮鬥的結果。

不過，我們是以愛好和平著稱的民族，我們並不是妄想戰勝日本，更不是好勇鬥狠而願意結下百年不解的仇恨。我們是絕對相信世界人類的大同，中國三民主義國家的建立，只有東亞兩大民族互相諒解互相團結之後，才能够完全實現。本來中日兩國是不應該作鬩牆之爭的；不過為了過去日本污辱了我們，輕視了我們，我們不得不表現出我們的精神與力量來，以糾正他們此種錯誤的觀念。現在經一場廝打之後，日本既感悟到無力征服中國，中國亦感悟到中國主觀的力量以

及國際客觀的環境，都不可能打到島國去，在此種相互認識之下，誠意的釋兵言和，共謀東亞的繁榮，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中日那一國的恥辱，是中日兩國的共同光明之路。

本來我們抗戰的目的，在本質上就是尋求真正的和平，在去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宣言裏頭曾說：「……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又說：「……以此之故，中國對於日本，既明示抗戰之目的，更本必死之決心，盡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瞭然於中國之目的，知中國終不可以暴力屈服，播然變計，放棄其侵略主義，更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然後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達，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真實之保障……」。今日日本既有所覺悟，而能與中國誠意的言和，則我們的抗戰目的已達，我們支持抗戰的目的與責任亦已完成，我們今後的目的，即應集中研究在如何條件之下，方能獲得全面的和平，平等的和，同時準備着以全力來復興戰後的新中國。

四 盲目的支持抗戰足以誤國

到了今天要是不問目的，不顧國家的利害，祇是在「最後勝利屬於中國」「抗戰到底」的口號之下，盲目的主張繼續抗戰，其結果不但是犧牲了金錢生命……並且足以召致亡國之慘禍。我們要知道，自國共合作以後，共產黨即暗受第三國際的指揮，利用中日相持的形勢，高唱着「焦土抗戰」，「抗戰到底」等口號，他們是不打量中國能否獲得勝利，祇希望中國抗戰的時間愈久愈好，犧牲愈大愈好。因為時間愈久，他們即可有充分的時間去擴充他們的勢力！犧牲愈大，則

他們赤化中國的可能性也愈大。還有一點，就今日的情勢看來，如果繼續抗戰，就非和共產黨合作不可。假使萬一抗戰勝利的時候，也就是共產黨在中國地位增高及政策勝利的時候。我們知道，共產黨革命的方法，是以沒收土地，廢除私人資本為其唯一的信條，現在西北邊區政府那邊不是已在實施了嗎？到了那時，在國民黨領導下的政權，如果還能不屈服於共產黨的主張而提出反對，那中國內部非重演一次的大崩裂不可。不然的話，我們的財產，尤其是僑胞投資的事業，可不是要全部被沒收了嗎？從另一方面觀察，不幸中國抗戰失敗，國民黨是沒有了，中國也是沒有了，但共產黨還可以挾着西北的土地人民，跑到第三國際的懷抱中去，但中國已經失陷的土地，尤其是我們僑胞的家鄉閩、粵二省，就只有永久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些地方上的同胞，隨之而做了亡國的遺民，這在共產黨是毫不在乎的，但試問這是不是我們主張抗戰擁護抗戰的初願。我想有遠見的人，總得應該注意到這一點。

或許有人說：共產黨是不會有這樣陰謀的。僑胞遠處在海外，對於國內的情形，稍為隔膜，當難免有了這種樂觀的論調，我們姑除開共產黨在戰區後方各種陸續發現的陰謀不說外，就前面說過西北邊區政府的行政，就完全是由共產黨支配着，中央是無權過問的。共產黨既言擁護政府，擁護統一，擁護三民主義，那末又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放棄這個組織呢？又如作戰時期，軍隊的統一指揮，尤屬必要，為什麼他們還保持着所謂第八路軍新四軍等的旗幟徽號呢？這明明是擁護其名，企圖擴張勢力是實。我們為要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我們應得對於當前國家的大計加以一番新估量。

國共分裂的前瞻 (讀者通訊)

裴 遠

時讀貴刊，我想借貴刊的一角，發表一點事實和感想。

長記得「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高調！

共產黨利用西安事變千載一時的機會，把蔣先生劫持了，不容氣的話，今天既已跌落天羅地網，不由你不聽咱們的指揮，恰巧隨有盧溝橋的炮聲，共產黨與高采烈，挾獨夫以令全民，起來抗戰，不則的話，就是漢奸，可以結束的戰爭不讓牠結束，二十九月的成績，造成了空前絕後的血淚債，死贖下來的老百姓都走投無路，焦頭爛額的了，可是無惡不作的共產黨，正趾高氣揚而躊躇滿志。打着統一陣線全民抗戰旗幟的共產黨，發出永不兌現的支票，「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麻醉老百姓，把「愛國軍」「守疆土」的責任，往大眾身上一推，準得做槍靶或炮灰，失地先來一個焦土，淪陷區來土匪式的游劫，苦與老百姓作對，嘴上說是在救民，赤化西北，斷送新運，明偷暗搶，把國土送給第三國際，這明明是亡國滅種，飾詞為救國，總括一句話，擲了抗戰招牌，趕那亡滅種的勾當。

盤踞重慶大權獨攬的蔣介石，在當初對共產黨的時期，認為癩疥之疾何足道哉，一味優容，沒有下絕大決心，把他剿滅，坐令匪徒張，串出西安事變的把戲，雖自稱為一切的領袖，實際做了第三國際傀儡的傀儡，眼見共產黨肆虐，毒饑遍西北，可是奈何他不得，然而擲了廿九個月的本梢，死拖着抗戰，弄得民窮財盡，衆叛親離，老是想咬緊牙關硬撐頭皮盡最後一點氣力，作孤注的一擲，希望第三國際的接濟，但狡猾的共產黨看到你日暮途窮，已早袖手旁觀，刺據了西北，正全力組織他的蘇維埃政府，一方面擴充實力，野心勃勃，說不定趁此機會，來一下掘老窠呢？不是嗎？「國共合作到底抗戰」的高調，終於主義利害的絕不相容，在天賦缺陷，同床異夢的怨耦，怎

能硬拉在一塊兒天長地久的合作呢？反臉分裂，事是意料中的事，不過時間久暫問題吧了，現在已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時期，雙方均已劍拔弩張，裂痕顯著，猝然爆發，恐怕為期不遠吧！在這醞釀最高度的時候，把最近雙方鈎心鬥角的事績，加以檢討，就會明瞭他們絕對矛盾的衝突因素所在了！

共產黨本來不講信義沒有國籍，中共的心目中，祖國二字，早已拋在東洋大海，愛國，愛的是第三國際，所以所作所為，一切惟第三國際之命是聽，抗戰了廿九個月，何曾見過共產黨作過正面戰，他唯一的工作，在後方宣傳鼓吹，驅前民趕上前綫去充炮灰，在戰區唯一的任務是失地焦土，最好達到寸草不留，盡極度破壞的能事，在淪陷區，則流動游擊，東放一把野火，西丟幾個火秧，弄得一切完了纔算心滿意足，中共的武力，只有担任所謂打游擊的工作而已，他所以攪得滿天星斗，不過想利用機會抬頭，執到一部份政權，好幹他赤化的毒計，抗戰，對外的幌子，漁利是心目中唯一的期望，靠武力上的便利，把奪取陝西甘肅割據了組成蘇維埃政府，實奪赤化，新運已開到蘇聯軍隊數千名，進駐哈密，滿布赤色恐怖，甘肅的蘭州，到有三千以上的紅軍指揮及技術人員，同時威脅利誘，雙管齊下，向甘肅青海兩省擁有強大實力的馬麟馬步芳馬步青，拉入懷抱，並施用舊五馬聯盟的首領的馬仲英，從中斡旋，煽惑夏派，的兩馬，（鴻達鴻賓）大其鼓中，這樣可以不費之力，擴大了赤化區，表面上雖然支持重慶政府的拖着抗戰實則靜待實力消耗，可以一舉而定全局，目前的西北特別區，及西南特別區，如國共分裂的全貌，再談第三國際，赤化全球的路線，本分東西兩幹線，西線，自侵波蘭以後！在白俄羅斯烏克蘭組織蘇維埃政府，囊括波羅的海北歐諸國，置於西疆外衛線奪奪海陸

空軍根據地，虎視眈眈，候機會向東南歐巴爾幹開闢赤色路線，東進線，第一步是滿蒙及中國西北，然後整個中國而日本，積慮處心，匪朝伊夕，最近朱德出席十月卅一日在克林姆宮所舉行之蘇聯第五次最高會議，對於赤化中國之初步，決議了五條，（一）在西北地方設立第三國際特別行政區，（二）擴大及加強駐蒙蘇聯國防軍之組織，（三）完成西北赤色交通路線，（四）增加中國共產黨之補助費用，（五）供給軍需品，這共產黨的陰謀，已昭然若揭，而毛澤東更痛罵蔣政權，罵得體無完膚，共產黨特有兵援劍及履及，養癰貽患，蔣政權實咎由自取，但整個中華民國的國脈，豈可輕易斷送，然已成強弩之末，力有不逮，亦只得坐視共黨猖獗，未有遏阻，蔣政權目前的處境，實亦大可哀已。再來談重慶方面的情形，共產黨這樣的揭着抗戰大招牌，禍國殃民，亦感覺到赤地數千里，瘡痍滿目，一步步的威脅，以及毒辣的陰謀，在在是以制整個中華民國而絕種，重慶政權的顛覆，是旦夕間事，行見神州陸沉，將歷萬劫不復的境地，一國元首的林森，老淚橫流，痛陳共黨禍國殃民的罪惡，且擴張地盤厲行赤化，毒辣的陰謀，已昭然若揭，而蔣政權初尚迷戀蘇聯之接濟，派與同黨有淵源之邵力子偕同張羣赴延安疏通調解，但共黨羽翼已豐，奢望特高，有反戈相向的動態！想向蘇聯接濟，但接濟雖有，為共黨所獨享，這一下碰了天字第一號的橡皮釘子，怎不把蔣政權活活氣個半死，授權藍衣社領袖賀衷寒常駐延安，對共黨處處加以監視防範，遇必要時，以斷然手段處置，一面并調兵遣將，先發制人妥加以防範，平素以反共見稱的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更極度憤懣，力主反共，朱家驊更有「有我無共，有共無我」之概，在重慶發表的談話，鞭辟入裏，現在照錄在下面，可以窺見國共分裂已到怎樣的程度了，「（一）中日和戰問題，乃國家大計，渝方政府，可自由決定，無須向共產黨方面商議。（二）中國共產黨聽命第三國際指揮，無法決定其立場。

（三）共產黨不聽從渝方的意旨，對邊區政府并未履行其宣言而予取消，且一切赤化活動，至今仍形擴張。（四）共產黨對內外政策，均不合中國現實環境。（五）共產黨迫農民繳納苛稅，非但不能解放農民，實屬違反國法行動。（六）共產黨為保全實力，攫奪政權，對於中日戰爭，供作局部之游擊，從來不肯參加大規模之會戰。（七）共產黨欺騙青年學生之事實，日漸暴露，受騙青年已多數表示失望，（八）對中國共產黨之處置，乃我國內政問題，并不因之影響中蘇國際關係」，這雙方內在的絕對矛盾的衝突，已形諸表面化，此次的決裂，在共產黨方面，一仍揭着全民長期抗戰的金字招牌，攻擊重慶政權抵戰的不力，以為藉口，重慶方面，深悔引狼入室，在朱家驊的一篇談話裏，很透澈的闡明着，反共為目前重慶政權一件重要工作，已無疑地展開在我人面前，共產黨的野心，那一刻忘記了取重慶政權代之的慾望，這樣的積不相容，造成分裂的局面，今前的嬗變，正未可逆觀呢！最近共黨在四川秘密活動的份子，已有不少的宣告失蹤，跌屜飛揚的共產黨，豈肯默爾而息，那末相互的摩擦，已將不可避免！所以重慶近頃中日戰事和平的呼聲，甚感塵土，先前譏刺汪主席和的要人們，也變更論調，說是不喪權辱國，為民生着想也可言和了，至於朱家驊談話末段「對於共產黨之處置，乃我國內政問題，并不因之影響中蘇國際關係」言外餘音，耐人尋味，果爾，則反共旗幟，討赤之師，將又重見於今日了。

這些都是實在的事實，我想，我們站在黨國的立場，是必須指出共產黨這些喪心病狂的勾當。

時論選輯

阿部首相的談話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華日報社論)

廿一日阿部首相對新聞記者團發表談話，謂日本必承襲近衛聲明原則，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以爲處理對華問題之方針：

一、日本願望中央政府成立後能活潑運用對重慶政府之關係，以統一和局。二、日本要求保持其在東亞的指導精神，三、日本對蒙疆華北比其他地方更爲關心，以適應該地與日「滿」間之地理政治經濟關係，尤其是爲了共同防共。四、日本在華方駐兵問題，當然包括在共同防共的問題之中。

我們認爲

(一) 將來中央政府能否活潑運用對重慶政府之關係以統一和局，端在此中央政府之產生及其存在之基礎是否健全。重慶政府何以淪爲地方政權？由於投靠蘇俄，依賴英美。故中央政府之產生與存在。其對日本的關係，必須是獨立自主。阿部首相言及「有謂可以乾脆改組中央政府，乾脆推倒蔣政權者，根據事實經驗，即能明瞭問題不能如此簡單。」這是很透徹的覺悟。中央政府非日本所能改組，蔣政府亦非日本所能推翻。厭棄蔣政權，復興國民黨的中央政府，這是中國人民的事，也只有由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努力來自動處理的。我們所期望於日本者，即爲日本對中國人民的此種決心與努力，予以尊重，協助中國人民所要辦的，而不指令中國人民怎樣去幹。只有根據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努力而產生，以

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努力爲支持的中央政府，纔能統一和局，而重慶政府的問題亦得自然解決。

(二) 英法合作，英國是居於領導的地位。但此種領導，絕非統制。日本能否建立並保持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即在於其能否以英法合作之精神從事中日合作。中國願意與日本合作，以之調整東亞的國際形勢，可是不願意中日合作落入合從連橫的窠臼，以深化東亞國際形勢之對立。阿部首相發表日本對第三國之政策，爲調整而非排斥，中日兩國軍事外交的一致與經濟合作，其對外任務，原是有如此纔能成立的。此種一致，既由於利害共同，而非由於強力的約束，則中日關係之構成，自然不應當而且也無須包含統制的因素。阿部首相謂「對於新政府，始終尊重中國主權，使之健全發達，此爲日本之原來目的。」中日兩國軍事外交的一致與經濟合作，其機構建築，原是有言樣纔能成立的。

(三) 汪先生的豔電有云：日本在防共協定期間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及華北爲限。在中日合作關係當中，內蒙附近及華北，在一定的期間，由於一定的任務，而有其特殊之處。但此種特殊之處，僅爲應付共同防共，而不牽涉到政權的本質。在政權的本質上，必須是絲毫無損於中國主權之統一自主的。其在經濟方面，內蒙附近及華北與日本之接觸特別頻繁，猶之乎意大利北部與德國之接觸特別頻繁一樣，根

據此種接觸上的頻繁而產生的合作方式，其特殊之處也只是在合作的方式而已，並不因此影響到合作的性質。中國經濟的完整與自主，即在內蒙附近及華北，一樣是不容有絲毫損傷的。

(四) 駐兵既是為了防共，故以防共協定期間內為限，

我們的態度

(十一月廿八日中華日報社評)

重慶方面對於本報日前批評「阿部首相的談話」，作種種猜測與曲解，此種猜測與曲解，只是暴露了蔣介石之徒的無知與惡意而已。

蔣介石之徒的說法之一，曰：「此文乃東京授意而撰，以期加強東京方面反對陸軍過度要求之立場者。」

我們却要告訴大家，「阿部首相的談話」一文，完全是根據汪先生的豔電的，而豔電則是十八個月的抗戰的結論。這個結論，又是汪先生及其同志在抗戰之初，乃至在抗戰以前所主張的一貫國策的發展。汪先生及其同志，在抗戰以前，主張避免戰爭；到了戰爭無可避免，主張以抗戰尋求和平；到了可以議和，主張斷然的議和，慎重的議和。這樣說來，豔電不但是十八個月的抗戰的結論，而且是近百年來的中日糾紛的結論，其根據的是歷史的事實，其秉承的億萬人民的信念。在日本尚未覺悟之前，我們以外交也以抗戰促使日本覺悟。在日本既經覺悟，而且有了近衛聲明之後，我們就提供方案，好叫中日兩國共同負責糾正十八個月的戰爭與近百年來中日糾紛的錯誤，徹底解除其癥結，這就是中日兩國相互尊重以取得和平合作。這種主張，一直為我們所信守

並且至多以內蒙附近及華北為限。除內蒙附近及華北以外，則是只有撤兵問題，沒有駐兵問題的。阿部首相一再說明駐兵問題包括在防共問題當中，而中日防共協定之精神又是做照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的，如此，則防共必絕對不干涉內政，而駐兵亦有其一定的範圍，是十分明白的。

而自近衛聲明以來也一直為日本所信守。「阿部首相的談話」一文是根據豔電而來的，事實上，阿部首相所說明的政策，也原來是根據近衛聲明而來的。

所以，汪先生及其同志在豔電及豔電前後的言論與行動，完全是中華民族的自發的產物，絕非由於外鑠。只有蔣介石這種奴才，根據其請示英美蘇，由英美蘇授意而決定和戰的經驗，纔會覺得獨立自主的抗戰是不可思議的，獨立自主的議和也是不可思議的！也只有蔣介石這種奴才，根據其利用外力以為內爭的手段之經驗，纔會如此設想，以為東京政界也是在利用對華事件以為內爭的手段，授意本報為文，以期加強東京方面反對日陸軍過度要求之立場。

蔣介石之徒的說法之二，曰：「汪精衛此文係對內而發，企圖在中國民眾間造成有利的印象者。」

我們却要告訴大家，我們有一個中心的信念，就是和平運動只有靠誠意，不能靠什麼權謀的。我們絕不請示英美蘇以與日本交涉，而與日本交涉的，我們也絕不欺騙英美蘇；我們絕不歪曲中國人民的志趣以與日本交涉，而與日本交涉的一是一，二是二，我們告訴民眾的亦必一是一，二是二，我們只有一個立場，就是中國人的立場，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和日本說話，也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和英美蘇說話，也站

在中國人的立場對中國人說話。汪先生及其同志離開重慶是爲了主和，就有豔電與天下人以共見。汪先生及其同志爲了主和，跑到淪陷區，也會經去過東京，都有報告及說明與天下人以共見的。反過來看看蔣介石，他有過好幾次因爲英美蘇的授意而表示願和，但是他連自己出來發表願和的談話都不敢，却叫王寵惠他們來說，又是說得吞吞吐吐的，爲什麼？就是因爲這樣子可以成則歸功於己，敗則諉過於人，這樣子可以「在中國民衆間造成有利的印象」！蔣介石並且有過好幾次派遣代表去東京，去香港以及上海等地，和日本代表進行和議，可是不讓人民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偷偷摸摸的議和，而不與天下人以共見呢？就是因爲這樣子可以躲避人民的監督與批評，有監督一定有攻擊派，有批評一定有責難者，不如瞞住不說，這樣子可以「在中國民衆間造成有利的印象」！

蔣介石之徒的說法之三，曰：本報發表「阿部首相的談話」社評，「殆以日方過度要求施諸汪精衛，致使汪難以成立可爲中國民衆接受之政權。」

我們却要告訴大家，這完全蔣介石之徒的說謊。蔣介石之徒總是以爲，要末不進行和議，如果進行和議，一定是雙方意見早已完全相同了。他們就在等待有這樣子的一天到來，中日意見完全相同，以至於無須談判，不議而實現了和局。他們看見我們在做和平運動，却仍然在對日本堅持，磋商，說明，真是「感覺訝異」萬分了一然而我們的一貫見解乃是，歷史上只有議和，沒有不議而和的。我們主張近衛聲明原則可以之爲開始中日兩國和平談判的基礎，有了基礎，仍然要經過談判，所以仍然要對日本堅持，磋商，說明。對此而「感覺訝異」，並且猜測中日和平運動的現實距離，是只有蔣介石之徒纔會如此呆頭呆腦，並且以這樣子的呆頭呆腦來賣弄狡猾！關於組府，我們不止一次的說過：組府是和平

運動的階段之一，我們必不避免，亦必不苟且。蔣介石之徒已往關於組府的宣傳，總是先來捏造一個消息，說汪派將在一天成立政權了，過了那一天，就來宣傳「汪派組府失敗」。於是又來捏造一個日期，又一次的宣傳「汪派組府失敗」。這種伎倆，一直沿用到現在，可是已經有所不同了。他們過去宣傳「汪派組府失敗」，總說是因爲「傀儡搶做官不成功」，可是現在，却說是因爲汪精衛此文的立場與阿部首相的立場不同了。這不能不說是蔣介石之徒對於我們的認識的一個小小的進步，然而還須學習，即學習認識汪先生之點也。在中國與阿部首相之以日本的立場，固然不是同一物，但在中日兩國的共同前途上，却有其接近之點，這個接近之點也就是近衛聲明及汪先生豔電以來中日兩國間出現了開始和平談判的基礎，這個基礎到了現在是更加穩固了。

而且惡意的，可是和平運動的開展，終於逼得他們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是以中國人的立場來做和平運動的。所謂「此文」的立場與阿部首相的立場不同，也就是承認我們並不是以日本人的立場來做和平運動的。所謂「企圖在中國民衆間造成有利的印象」，也就是承認是如本報社評所說那樣子的和平運動，中國民衆是可以贊成並且參加的。所謂「致使汪難以成立可爲中國民族接受之政權」，因而彼等均認爲「新中央政府」之成立，或將延遲若干時，也就是承認汪先生是在努力使組府合於中國民衆之要求，雖然他們在發現了每一個部份的真理之後，加上了「感覺訝異」，並且加上了無知的曲解與惡意的揣測，可是仍然不能自毀其所發現的部份的真理。於此，我們要告訴大家，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做和平運動，雖然到了今天纔爲蔣介石之徒所發現，他們發現了而又自悔其說了出來；可是這正是豔電以來我們的一貫態度，而且也是我們在抗戰之前及抗戰以來的一貫態度。我們認爲中日必須和平，和平運動必然是有前途的。我們也擔心和平運動會做得不好，可是我們一定要和全國人民大家把和平運動做它好來！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一日)

國內

近來日本方面屢發期望中國新政府早日成立的談話，有的談到撤兵，有的談到怎樣協助，有的談到經濟合作。中國朝野對新政府成立的期望也很殷切，他們關懷政府何時成立，政府怎樣組成，怎樣停戰，如何實現和平。這些具體

而枝節的問題須待政府成立以後，按部就班的做去，因為和平運動的目的極為遠大，改組政府不過是和平運動工作的一方面，一階段。而政府組成以後對於和平運動的目的能否實現，要看我們組織成什麼樣子的政府。

我們曾一再聲言，和平運動的目的是求永久的和平，不僅是中日兩國間的永久和平，而且是東亞的永久安定。所以和平運動的工作，不僅要把消滅中日間兩年有餘的慘酷戰爭，而且要把幾十年以來兩國所積的深仇大恨，從根本上消滅了去。這些工作容易做麼？不容易。這還不算，這不過是和平運動的消極工作，更積極的工作是完成現代中國的建設，進而與日本相互提攜，建立共存共榮的東亞安定局面。無論從消極或積極方面去看，都是艱巨繁重的工作，須有絕大的力量始能擔當勝任。這較大的力量產生於和平運動者的長期努力與獨立自主的政府的適當措施。和平運動者既然冒險排萬難，從事挽救國家民族的和平運動，救國家民族的之不逮，和平運動者的努力是不會休止的，和平運動的工作不僅是長期的，而且是無盡止的。和平運動不僅出現於現代，而還要出現於未來。任何有文化有歷史的民族，決不會坐視其生存寄託的祖國淪胥以盡。

至於改組後的政府怎樣才能有適當的措施，必須政府的統治是有力的，發號施令是自主的。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將無法推行政令，沒有獨立自主的政府，將無法行使適當的措施。獨立自主政府的產生，一方面須要和平運動者

及國人之不斷努力，堅苦支持，同時也需友邦日本放大胸懷，誠心協助。日本所以與戰敗的中國講和，就因為日本不能以戰爭建立東亞安定之局。東亞安定之局有賴於中日兩國的合作，不賴於兩國的鬥爭，或彼此起此伏。怎樣才能完成中日的密切合作呢？必須兩國均有強而有力獨立自主的政府，不受國內的牽扯，沒有國際的壓力，否則平等合作的局面，便無由取得。爲了兩國的存亡安危，中日合作，不但於中國有利，並且於日本有利，於東亞有利。在合作的原則之下，中國和日本外交方針一致，國防方針一致。彼此之間既然不會再有衝突，更可以攜手共進，以應付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對於其他國家，要聯合那個，便兩個國家一起與之爲友，要對抗那個，便兩個國家一起與之爲敵，只有這樣才可以奠定東亞之永久和平，只有這樣才可以謀大亞洲主義的實現。——中國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擔東亞的責任，並且要力量來分擔這個責任。如果中國還不能夠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如果中國還不能夠得到自由平等，中國便沒有力量來分擔安定東亞建設東亞的責任。……在中國，爲本身着想，爲分擔東亞的責任着想，固然要努力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在日本，爲本身着想，爲謀中國與之分擔東亞的責任着想，也要以先進國的地位，幫助中國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

中國現正爲爭取其民族獨立，國家的自由平等，從事於戰爭，現又棄戰而從事於和平運動。日本爲東亞着想，爲自身着想，應當幫助中國實現中國的願望，使中國能建立起其獨立自主的政府，使中國的國家能自由平等立足於世界。否則這次和平運動又不過是大戰的間歇，未來中日兩國的相互報復，正無已時。所以汪先生說，「我深盼這次和平運動，中日兩國能够從根本上做起，爲中日關係劃一新時代，爲東亞劃一新局面。本於平等合作的精神，確立兩國一致的外交方針，國防方針。方針一致，則善鄰友好，可以做到，共同防共，可以做

到，經濟提攜也易於着手了。

重慶政府自重慶的六中全會決定改換行政院長以來，已有多日，喧嚷中的行政院各部改組終未實現，宋子文與孔祥熙鬥爭，共產黨又向國民分官位。共產黨趁抗戰失敗，向重慶政府要求地位，重慶政府有一派人想容納共黨的要求，國民黨中的元老派則反對共產黨加入政府，由於國共鬥爭的尖銳，影響到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四川各將領反共甚烈，西北各將領也反對共產黨出竄祖國的醜惡行動。西南由於南甯失守，中央想趁機會派兵入往雲南，龍雲反對。龍氏一方面派兵堵絕中央軍入滇，一方面自飛往河內，另籌自存的良策，重慶所屬下中央與地方及國共之間的鬥爭，漸漸揭幕了。

國際 磁性水雷，使大英帝國的海航發生危險，英國為報復起見，已宣佈在公海上沒收德國輸出之貨物。

據說「英國政府此舉，確有法國政府完全同意，並經熟權利害後決定之，蓋以德國出口貿易，乃外匯之主要來源，茲予以打擊，其影響自極重大也」。英國封鎖德國出口貿易之命令，經英王喬治六世於二十七日簽署，二十八日公布，十二月四日起施行。各項檢查法匪特適用於來自德國或其隣邦之貨物，即來自隣近德國而并不與之接壤各國，如瑞典挪威威爾斯兩國者，亦須一併受檢。德國認為英國的封鎖類似海盜行為，正謀對付辦法。德國政府並於二十九日發表公式聲明，指摘英國此項措施侵犯國際公法，尤與一八五六年所締結之巴黎宣言，更相背道而馳。此次新的侵犯國際法措施，不僅德國即中立各國亦將蒙受影響，以故德國政府對於此舉所釀成之新情勢，特保留一切手段。英首相張伯倫又於二十六日發表廣播演說，重申作戰目的及戰後措置，他說「英國為保障自由與獨立和平而戰，自由與和平為英帝國存亡所繫之兩大原則，今英帝國全部皆慷慨迅速，

以其物質上與精神上之援助給予英國，以期達保障自由與獨立和平之目的，殊可感也。……吾人戰爭目的，在擊敗敵人，不儘摧毀敵方之武力，且欲消滅敵方始終謀以武力支配他人之侵略心理。蓋此種心理，以蹂躪無辜人民為快意，並藉國家利益之名義，以隨時隨意背棄自己諾言為合理也。如德國人民能覺悟此種精神亦不利於自己與不利於世界其他人民相同，則當可拋棄之，如果能若是，不得流血則誠佳矣。惟此精神必須拋棄，此即吾人作戰之目的，吾人將繼續奮鬥，至達到此目的時而後已。……吾人志願，在植立新歐洲，此非依據戰勝者意旨，重繪歐洲地圖之謂，但為各國具有新精神，願以好意以相互忍耐處理困難之歐洲，在新歐洲各國中，當不復有侵略惶恐之存在。凡屬必要的疆界之調整，須由以平等地位出席於圓桌會議之隣邦解決之，如屬必要，得以無偏袒的第三國之襄贊，助其解決。歐洲國家間應有商業之充分流通，且各國應有在並不採行損及隣國之對外政策時，自制其政體之權，苟歐洲不能如是，則不能認為有永遠和平。軍備當視同無益之糜費而漸撤除之，僅留為維持國內法律與秩序所需要之一部份，此事須若干年始能告成，故須有能以指導新歐洲，沿適當途徑進行之機關，希望德國為此新精神所感動，而為參加此種工作之一國」。

赤色帝國蘇聯現在完全暴露出它的猙獰面貌了，斯大林既與希特勒瓜分波蘭，現在又趁機侵略芬蘭。蘇聯說芬蘭受第三國之唆使仇視蘇聯，二十九日撤回駐芬外交代表，三十日起蘇聯軍隊即越界向芬蘭進攻，芬蘭已在不屈服之原則下改組其政府從事抗戰，蘇聯軍隊遭芬軍英勇抵抗，無什進展。芬蘭政府自始至終並未採挑釁態度不過抱有一種決心，不肯屈服以致損害其主權。蘇聯以芬蘭邊界逼近列寧格為作戰藉口，所謂馬克思列寧的信徒的宣傳豈不令人好笑。共產黨們處此情況下，你們反侵略的目標是誰呢？